

SICHUAN DAXUE ZHIXUE SHEHUI KEXUE XUESHU ZHUZUO CHUBAN JIJIN CONGSHU

四川大学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著作出版基金丛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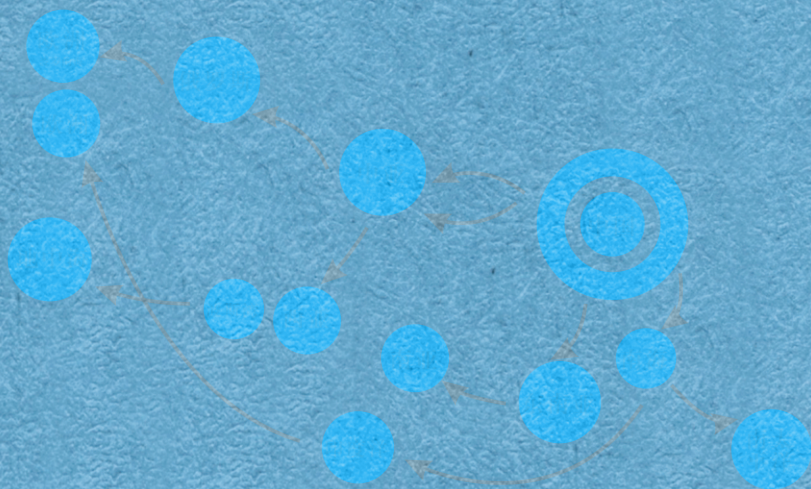
四川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研究专项（哲学社会科学）项目资助（SKCB201605）



“一带一路”战略构想

渊源、实践与金融支持研究

朱莉 兰京 戴齐 朱源秋 著



四川大学出版社



SICHUAN DAXUE ZHIXUE SHEHUI KEXUE XUESHU ZHUZUO CHUBAN JIJIN CONGSHU

四川大学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著作出版基金丛书

四川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研究专项（哲学社会科学）项目资助（SKCB201605）

“一带一路”战略构想

渊源、实践与金融支持研究

朱莉 兰京 戴齐 朱源秋 著



四川大学出版社

前 言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的经济得到了迅猛发展，经济总量不断增长，在全球经济格局中的地位逐渐显现。经过长期的努力，中国已经跃升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和全球最大的货物贸易大国。

然而，当今世界正在发生复杂深刻的变化，世界经济在深度调整中曲折复苏，新一轮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蓄势待发，国际金融危机的深层次影响在相当长时期内依然存在，全球经济贸易增长乏力，外部环境中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各国面临的发展形势依然严峻。在这种错综复杂的形势下，要确保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需要我国政府构建更高层次、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体制和新格局，在新一轮国际合作和竞争中占据主动。

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高屋建瓴，创造性地提出了“一带一路”总体战略构想，让经济相对发达的东部地区带领中西部地区、让沿海地区带动内陆地区，东西相济、海陆互补，推动全国区域经济共同协调发展。

“一带一路”，源于古代中国与西方各国人民自然而然开辟出来的一条交通商贸大道。这一通道既承载了中国古代对外交往的历史使命，又记录了历经的沧桑。今天，再创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的辉煌是中国政府统揽全局、顺应大势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这一宏伟构想给古代丝绸之路赋予新的时代内涵，为泛亚和亚欧区域合作注入新的活力。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中国需要继续发展与周边国家和西方国家的贸易交往，通过更加全面的文化交流、战略共谋，建设平等互利的经济共同体，拓展中国的外部需求；通过发展外部经济区域带动内部需求，促进我国国内区域经济均衡发展；通过世界市场推动政府的供给侧改革，以市场加政府的模式实现目前经济发展的需要。

“一带一路”战略是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当今世界多极化格局下，为应对全球形势深刻变化、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而做出的重要战略抉择。推进“一带一路”重要战略，是继续全面深化改革，构建中国改革开放升级版的必然要求；是继续全面深入开展国际合作，促进欧亚大陆国家共同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

“一带一路”构想与“中国梦”的理念相辅相成，都是国家大战略，对探寻经济增长之道，实现全球化再平衡，开创地区新型合作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在此背景下，国内著名学者、经济学家，社科院、国务院研究中心、商务部的众多著作纷纷应运而生。

本书主要从“一带一路”战略构想提出的背景、意义、所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出发，对“一带一路”战略构想与中国古代丝绸之路的渊源，中国开展“一带一路”建设所面临的困境、机遇、具体实践以及中国开展“一带一路”建设所需要的金融支持进行了系统分析。

全书以先宏观后具体措施的原则对“一带一路”进行总分式解读，深入分析了中国开展“一带一路”建设中面临的各种机遇与困境，并针对这些问题从世界经济、国际贸易的角度出发，深入理解阐述了国际经济走廊建设的思路与构想。本书针对这些构想提出了一系列的金融配套方案，以发挥金融在经济中的核心作用，尤其是发挥亚投行在国际金融秩序重塑中的作用，最后提出了“一带一路”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具体路径及相关政策建议。

四川大学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著作出版基金丛书
编委会

主 任 杨泉明 谢和平

副主任 罗中枢 晏世经

委 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吕志刚 朱方明 罗志田 段 峰 姜晓萍

项 楚 姚乐野 卿希泰 唐 磊 徐玖平

曹顺庆 黄宗贤 蒋永穆 霍 巍

丛书序

四川大学（以下简称川大）是中国近代创办的最早一批高等教育机构中的一个。近十余年来，川大又经两次“强强合并”，成为学科覆盖面较广、综合实力较强的综合性大学。一百多年来，川大的人文社会科学在学校日益壮大的过程中，从国学研究起步，接受现代科学的洗礼，不同的学术流派融合互动，共同成长，形成了今日既立足于中国传统，又积极面向世界的学术特征。

作为近代教育机构，四川大学的历史要从 1896 年设立的四川中西学堂算起。但具体到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则可以追溯到清同治十三年（1874 年）由张之洞等人创办的四川尊经书院。在短短二十几年的办学历史中，书院先后培养出经学家廖平、思想家吴虞等一大批在近代中国学术思想史上影响巨大的学者，也因此使四川成为国内研究经、史、文章等中国传统之学的重镇。此后，在 20 世纪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以国学为主要研究对象的近代“蜀学”成为川大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主流，拥有张森楷、龚道耕、林思进、向楚、向宗鲁、庞俊、蒙文通、刘咸炘、李植、伍非百等一大批国内知名的学者。

近代蜀学在研究内容上以传统学术为主，在观念与方法上则立意求新。廖平经学思想曾经作为 19 世纪晚期变法维新的基本理论依据之一，其知识背景上也不乏西学色彩。20 世纪 20 年代成长起来的一批学者如庞俊、刘咸炘等人，更是亲自参与了中国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的转变。其中，蒙文通由经向史，同时又广涉四部之学，在晚年更是力图从唯物史观的角度探索中国社会与思想的演进，最能代表这一学术传统的是其包容、开放并具有前瞻性的眼光。

自 20 世纪 20 年代开始，现代社会科学的深入研究也逐渐在川大开展。1922 年至 1924 年，吴玉章在此教授经济学课程，鼓励学生通过对社会科学的研究，思考“中国将来前途怎样走”的问题。1924 年，学校设立了 10 个系，在人文社会科学 6 个系中，除了延续着蜀学风格的中文系外，教育、英文、历史、政治、经济 5 个系均着力于新的社会科学研究。这一科系的设置格局一直持续到 30 年代初的国立四川大学时期。

川大的另一源头是私立华西协合大学（以下简称华大）。作为教会学校，华大文科自始即以“沟通中西文化与发扬中西学术”为宗旨，而尤擅长于西式学问。其中，边疆研究最具特色。1922 年创办的华西边疆研究学会（West China Border Research Society）及其会刊《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志》（*Journal of the West China Border Research Society*）在国际学术界享有盛誉。华大博物馆以“搜集中国西部出土古物、各种美术品，以及西南边疆民族文物，以供学生课余之参考，并做学术研究之材料”为目标，在美籍学者葛维汉（David Crockett Graham）的主持下，成为国内社会科学研究的另一基地。

华大社会科学研究的特点：一是具有较强的国际色彩；二是提倡跨学科的合作；三是注重实地踏勘；四是对边疆文化、底层文化和现实问题更为关注，与国立川大更注重“大传统”和经典研习的学术风格形成了鲜明对比。双方各有所长，其融合互补也成为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两校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趋向。从 20 世纪 30 年代中期开始，华大一方面延请了庞俊、李植等蜀学传人主持中文系，加强了其国学研究的力量；另一方面致力于学术研究的中国化。一批既经过现代社会科学的训练，又熟悉中国古典文化的中国学者如李安宅、郑德坤等成为新的学术领袖。

1935 年，任鸿隽就任国立四川大学校长后，积极推动现代科学的发展。1936 年 5 月，川大组建了西南社会科学调查研究处，在文科中首倡实地调研的风气，也代表了川大对西南区域跨学科综合性研究的发端。此后，经济学、社会学、民族学、考古学等领域的学者组织开展了大量的实地考察工作，掌握了西南地区社会文化的第一手资料。在历史学方面，较之传统史学而言更注重问题导向和新材料之扩充的“新史学”也得到了蓬勃发展，并迅速成为国内史学界的重镇。20 世纪 30 年代后期开始，川大校内名师云集。

张颐（哲学）、朱光潜（美学）、萧公权（政治学）、赵人儻（经济学）、徐中舒（历史学）、蒙文通（历史学）、赵少咸（语言学）、冯汉骥（考古学、人类学）、闻宥（民族学、语言学）、任乃强（民族学）、胡鉴民（民族学）、彭迪先（经济学）、缪钺（历史学）、叶麟（文艺心理学）、杨明照（古典文学）等一批大师级学者均在此设帐，有的更任教终身，为川大文科赢得了巨大声誉。

在不同学术流派的融合中，川大人文社会科学形成了自己的特点：一方面具有传统学术通观明变之长，另一方面又具有鲜明的现代学术意识。1952年，在院系调整中，随着华大文科的并入，川大人文社会科学进入了飞速发展的新时期。半个多世纪以来，在继续保持传统优势学科如古典文学、语言学、历史学、考古学、民族学发展的基础上，新的学科如宗教学、理论经济学、敦煌学、比较文学、城市史学等也成长起来，涌现出了一大批在国内外学术界受到极高赞誉的学者，为川大文科未来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为了继续发扬深厚的学术传统，推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新繁荣，2006年学校决定设立“四川大学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川大学者尤其是中青年学者原创性学术精品的出版。我们希望这套丛书的出版，有助于川大学术大师的不断涌现和学术流派的逐渐形成，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作出贡献。

目 录

第一章	“一带一路”战略构想提出的历史背景和渊源·····	(1)
第一节	“一带一路”战略的历史背景·····	(2)
第二节	“一带一路”建设的现实背景·····	(11)
第三节	“一带一路”战略的内涵和构思·····	(18)
第二章	“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主要内容和战略意义·····	(24)
第一节	“一带一路”构想的核心内容·····	(24)
第二节	“一带一路”建设的战略意义·····	(31)
第三节	“一带一路”战略布局及预期目标·····	(34)
第三章	“一带一路”战略构想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41)
第一节	“一带一路”建设的机遇·····	(41)
第二节	“一带一路”战略面临的挑战·····	(46)
第四章	“一带一路”战略构想与国际经济走廊·····	(51)
第一节	中蒙俄贸易经济走廊的构想与建设·····	(53)
第二节	新亚欧大陆桥的构想与建设·····	(59)
第三节	中巴经济走廊的构想与建设·····	(63)
第四节	中印缅孟经济走廊的构想与建设·····	(66)
第五节	中国—中亚—西亚经济走廊的构想与建设·····	(69)
第六节	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的构想与建设·····	(72)
第七节	海上丝绸之路的构想与建设·····	(75)

第五章	“一带一路”战略构想与国际金融秩序变革·····	(78)
第一节	国际金融秩序的变革·····	(78)
第二节	“一带一路”背景下的国际金融秩序分析·····	(81)
第三节	亚投行的战略意义·····	(84)
第四节	亚投行在中国金融外交战略中的地位与作用·····	(89)
第五节	亚投行所面临的机遇与困难·····	(93)
第六章	“一带一路”战略构想与中国金融发展·····	(97)
第一节	“一带一路”战略不是中国版的“马歇尔计划”·····	(97)
第二节	“一带一路”建设中的经济金融效应分析·····	(103)
第三节	“一带一路”建设中的金融支持·····	(110)
第四节	“一带一路”建设与人民币国际化·····	(119)
参考文献	·····	(133)
后 记	·····	(139)

第一章 “一带一路”战略构想提出的历史背景和渊源

2013年9—10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访中亚和东南亚期间，先后在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和印度尼西亚的演讲中提到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简称为“一带一路”。这是中国第一次提出建设21世纪“一带一路”的概念和构想的倡议。^①该倡议旨在拓宽、加深、提高和欧洲、中亚、西亚及东盟等友好国家的全方位合作，包括贸易、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海上合作、安全等领域的合作。同年的11月，这一倡议在中国共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讨论通过，被写进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之中，这就标志着“一带一路”的倡议已经上升到我国全方位对外开放的重大战略决策层面。

“一带一路”借用了我国古代的丝绸之路的概念，在全球一体化日益加强的今天，通过和平发展、互助互惠的共赢模式，通过经济文化和政治的交流，使我国与沿途的国家和地区发展良好的伙伴关系，成为利益共同体。

^① 2013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哈萨克斯坦的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弘扬人民友谊，共创美好未来》的演讲中，提出：“为了使我们欧亚各国经济联系更加紧密、相互合作更加深入、发展空间更加广阔，我们可以用创新的合作模式，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2013年10月，他在印度尼西亚国事访问中，在印度尼西亚国会演讲关于中国与东盟关系发展时提出：“东南亚地区自古以来就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中国愿同东盟国家加强海上合作，使用好中国政府设立的中国—东盟海上合作基金，发展好海洋合作伙伴关系，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秦玉才、周谷平、罗卫东：《“一带一路”读本》，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10月，第13~14页。

第一节 “一带一路”战略的历史背景

一、古代陆上丝绸之路的形成与发展

（一）陆上丝绸之路名称的来由

“丝绸之路”的名字，来源于 19 世纪 70 年代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的著作《中国——亲身旅行和据此所作研究的成果》，他在书中提到以丝绸贸易为媒介的西域交通路线；之后有瑞典探险家赫定在 1936 年出版了他的探险之旅的著作《丝绸之路》，从而使这一称谓得以广泛传播。虽然李希霍芬所提到的丝绸之路还只是比较狭义的，主要蜿蜒在沙漠中的，连接中国和中亚阿姆河流域、锡尔河流域以及中国和印度之间的“沙漠之路”，但是丝绸之路这一名称还是得到了中外学者的认可，人们将始于两千多年前连接中国和中亚、南亚、西亚、印度并且通往欧洲东部和非洲北部的和平友好、经贸往来和文化交流的通道都统称为“丝绸之路”。

这条通道历史悠久，现代自殷墟出土的文物中，就有来自新疆和田的玉石。《汉书·西域传》中，班固提到了自玉门关和阳关出西域的两条路线“南道”和“北道”，分别指沿着昆仑山北麓向西经过葱岭（即今天的帕米尔高原）达到当时的大月氏、安息，以及自天山南麓翻越葱岭后达到当时的大宛、康居等国家的两条路线。汉武帝派遣张骞两次出使西域，史书称为“张骞凿空”。根据张骞的报告，《史记·大宛传》和《汉书·西域传》里详细地记载了西域沿途的五十多个地方政权、丝绸之路的具体路线和途经的重要城镇。

直到宋代开始发展海上运输之前，这条商贸通道都是中国和西方各国交往的重要纽带。

广义的“丝绸之路”除了指从长安西行出关的通道，还应该包括在西汉时就已经存在的从成都经云南联系汉藏南亚商贸的茶马古道。

（二）陆上丝绸之路的历史路线

据近年来中国学者对古籍的研究考证，结合考古发现和实地考察，历史上最早往来于西域各国和中国之间商贸团队的陆上主要通道——从长安到武威至张掖和敦煌，基本上又分三条路线：一条是北道，一条是南道，还有一条是略晚于南北两道，流行于唐代的一条通道。北道是从西安出发向西经过咸阳、天水、武山，翻越六盘山，从甘肃的靖远渡过黄河，经过景泰到达武威、张掖、酒泉、安西和敦煌。南道是从西安出发沿渭河达到凤翔和千阳，沿着千河河谷，从古陇关翻越陇山，向南到天水，再沿着渭河向西经过陇西、渭源，翻越乌鼠山到临洮后再往西行，经临夏沿大夏河北上，于永靖炳灵寺附近渡过黄河，往西北渡过湟水到达西宁，再沿大通河穿越祁连山达到张掖、敦煌。第三条是从西安沿南道到达临洮后，向北沿着阿干河谷在兰州渡过黄河，沿着庄浪河翻越乌鞘岭到达武威，这一条线路在唐代发展成为一条重要的通道。

在这几条主要的交通商贸通道的基础上还发展出了许多支线，包括连接敦煌和新疆昆仑山北麓的青海路和从陕北靖边渡过黄河沿阿拉善高原北经居延海到达新疆的居延路等。不论是从哪一条路线出境，在中国境内基本上都要经过四个自然地理单元，即陇西黄土高原、河西走廊、塔克拉玛干沙漠和帕米尔高原。从长安出发西行都必须过“一山一河”，即翻越六盘山和渡过黄河。六盘山古称陇山，陇西高原就是陇山以西，经过乌鞘岭、日月山，北沿长城，向南到秦岭的黄土高原的最西部。翻越了海拔 2000 多米的陇山后，便要渡过丝绸之路上泥沙最多的黄河。最重要的渡口在三处：一是甘肃永靖的炳灵寺附近，这条路就是从临洮渡洮河沿大夏河北上，于永靖渡过黄河，沿湟水河、大通河穿越祁连山到达河西走廊的张掖；二是从临洮往北经阿干河谷到兰州渡黄河，沿着庄浪河穿越乌鞘岭到武威；三是西安出发沿泾水谷地穿越六盘山，沿祖厉河在靖远渡黄河，经景泰西到武威。经这三处渡过黄河之后，便进入了河西走廊，这是一条从乌鞘岭到敦煌，位于黄河以西的狭长地带，大约 1000 公里，介于高山沙漠之间，南北宽度 10 公里到 100 公里，是中国古代唯一连接东西的通道。当汉王朝国力日益昌盛的时候，为了保护和发展这条通往西域各国的商贸之路，他们依靠自己占据河西走廊广大

地区的优势，在丝绸之路的绿洲上设立了武威、张掖、酒泉和敦煌等郡，修长城到玉门关，重兵防守，形成强大的防御能力，把匈奴赶到漠北，以保障商旅驼队往来于京城与西域之间运送大量的熟绢和丝绸等商品。

从敦煌往西行，就进入塔里木盆地中的塔克拉玛干沙漠。沿沙漠南北边缘继续向西，就必须过葱岭，即号称世界屋脊的帕米尔高原，其平均海拔5000米，汇集了好几座亚洲最大的山脉，如喜马拉雅山脉、喀喇昆仑山脉、天山山脉和兴都库什山脉。晋代的僧人法显和唐代僧人玄奘都记载了路经这两个地方亲身体验过的艰辛和危险。出敦煌经伊吾（哈密）过北庭（吉木萨尔），路经乌苏、伊宁到碎叶城（阿拉木图），然后到里海沿岸的地区；或者由伊吾向西南过蒲昌（鄯善）和高昌（吐鲁番），西行过轮台、龟兹（库车），由阿克苏转向碎叶城或者疏勒（喀什），由疏勒继续西行到波斯（伊朗）和地中海沿岸地区；最南边一条路线西出阳关，经于阗（和田）到塔什库尔干，经伊朗去阿富汗或者南下印度。

茶马古道兴起于汉藏之间的茶马互市，“它是连接横断山脉与喜马拉雅山脉两大民族文化带的走廊；它主要呈东西走向，并与南北走向的人们所谓的南方陆上丝绸之路（西南丝路）形成交汇并部分重合，同时与费孝通先生反复强调的藏彝走廊形成部分交汇和重合”。^① 据司马迁《史记·西南夷列传》《史记·大宛列传》等载，“远在西汉时，早就存在着一条由四川经云南到缅甸、印度以至西亚等地的经商之路。此后汉王朝开辟了博南道，由这条路去博南（今永平）、渡兰津（今霁虹桥渡口一带），越永昌（今保山）经腾越，出干崖（今盈江），使‘丝道’得到进一步发展”^②。茶叶、马匹、盐、铁、皮毛、山货、药材、棉纱、棉制品、丝绸、琉璃、海贝、安息香、瓷器，以及其他各种商品物资，通过这条茶马古道由马帮运输往来贸易于四川、云南和缅甸、印度等地，甚至通过印度转销西亚、非洲和欧洲。

这一通道也就是张骞出使西域之前在西南存在的另外一条交通要道，司马迁记载了这段历史：“乃令骞因蜀犍为发间使，四道并出：出犍，出冉，出徙，出邛、僰，皆各行一二千里。其北方闭氐、笮，南方闭僬、昆明。昆

① 李旭：《茶马古道：横断山脉、喜马拉雅文化带民族走廊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50页。

② 张竹邦：《滇缅交通与腾冲商业》，《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29辑，第142页。

明之属无君长，善寇盗，辄杀略汉使，终莫得通。然闻其西可千余里有乘象国，名曰滇越，而蜀贾奸出物者或至焉，于是汉以求大夏道始通滇国。初，汉欲通西夷，费多，道不通，罢之。及张骞言可以通大夏，乃复事西南夷。”^① 汉武帝为打通这条通道，征云南，设四郡，至汉明帝时期设立永昌郡，统治川西南、云南，南连缅甸、西连西藏，北通巴蜀，东接滇越。所以许倬云先生认为，自汉代打开西南夷的道路后，从成都出发可以走三条通道：“第一条大路是向西南进入澜沧江；第二条是向南进入红河以及西江，然后向西联系到缅甸，向南联系到广东；第三条则是正西方，朝向青康藏的一条大道。”^② 这第三条道就是汉代以来演进成为茶马古道的道路。

（三）陆上丝绸之路的发展

汉武帝时期，西汉王朝通过军事、政治和外交等手段，使得通往西域的丝绸之路得以畅通和发展。在军事上，汉王朝战胜了匈奴，打败车师和楼兰，出兵大宛，使得丝绸之路这一重要通道摆脱了匈奴的控制；在外交上，张骞出使西域，完成“凿空”的历史使命；在行政上，西汉第一次在西域的轮台和渠梨（库尔勒西南）设立官吏使者校尉，建立政府管理屯田等事务，后又在乌垒城（轮台东北）设立西域都护，总管西域事务。这一时期丝绸之路更加畅通、发展和繁荣起来。直至西汉末年，战乱纷纷使得汉王朝对西域地区的军事政治控制减弱，北匈奴入侵，一度阻断了南北丝绸之路。后来东汉大将军窦固平息西域，班超出任西域都护，并派遣使节甘英出使大秦（罗马帝国），甘英虽受到安息（伊朗）的阻挠而未到达欧洲，但也抵达了现在的波斯湾（条支海）、地中海（临大海）。公元166年，有史料记载有人自称大秦使者自日南（越南）到达了当时的首都东京（洛阳）。这是古代中国和古罗马帝国最早的友好交往的记录。

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战火不断，西域各国纷争加剧，丝绸之路的交通也受到一定的破坏，但是东西方的商贸活动一直没有停止。1907年，敦煌以西的古长城遗址的出土文物“古粟特文信札”，记录了中亚的粟特商人

① [西汉] 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715~716页。

② 许倬云：《万古江河》，上海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99页。

经过敦煌到金城（兰州）贩卖毛毡和大麻织物等商品的情况。公元 399 年法显西行印度，14 年后从海上回南京。据他的经历所写的《法显传》，记录了中亚、印巴、斯里兰卡等地的历史和人文，为古代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提供了珍贵的历史资料。

隋唐时期，随着军事国力得以恢复和强大，疆土扩张，发展西域自由贸易的政策加强，隋炀帝特派裴矩到张掖支持“互市”。据裴矩所著《西域图记》一书中记载，当时的商贸通道经敦煌后，除在西汉时期就已经打通的经高昌和鄯善两条路线以外，还发展了经伊吾往西的第三条通道。至唐代西部疆土拓展，丝绸之路上的中西经济、文化、宗教交流都达到一个鼎盛时期。隋唐王朝对西域的经营，保证了丝绸之路的畅通，在其首都长安和陪都洛阳等地有很多西域各国的商胡活动，甚至有波斯人在朝中为官，达到了中外东西交流的盛世。《册府元龟》《续玄怪录》《寺塔记》中都有对波斯商人的记录。《新唐书》中的《李元谅传》所描述的这位官居尚书左仆射、镇国军节度使的李元谅就是一位波斯人。商胡、僧人、旅行家促进了中西的经济和文化交流，留下了大量记载丝绸之路沿途自然人文发展变化的著作，如《中天竺国行记》《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大唐西域记》等等，敦煌更是成为当时国际化的贸易市场，石国、曹国、粟特、波斯、印度、中原的商人都汇聚于此，交易包括中国、东罗马、印度甚至高丽的商品。

五代以后直至元代，由于战火燃烧，西域民族纷争，中亚政治动荡，丝绸之路一度衰退。直到成吉思汗的蒙古大军统一了蒙古高原，三次西征攻陷巴格达，灭掉阿拔斯王朝，扩张了蒙古帝国版图，设驿站、派遣使臣，才恢复了丝绸之路交通网络，使一度衰败的丝绸之路再次复兴，使丝绸之路西端到达的地方更远，加强了中国和欧洲各国的交往，许多欧洲旅行家都到中国留下了大量的游记，如著名的马可·波罗、路布鲁克、勃朗嘉宾等。

元朝灭亡后，明朝军事力量不够强大，无力维护西部边疆的安全，使得丝绸之路的贸易往来逐渐衰败。明朝修建嘉峪关长城以抵御蒙古残余势力，在一定程度上也限制了丝绸之路的交通。嘉峪关所在的肃州（今甘肃酒泉）成为明朝重兵把守的边关，对再往西的疆土则无暇顾及，更谈不上维护以往繁华的边贸通道。至此，昔日辉煌的陆上丝绸之路逐渐没落。

二、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和发展

古代陆上丝绸之路逐渐衰落的另一个原因，是随着自宋代开始的制造技术、航海技术的发展，指南针普遍地使用于航海，海上贸易逐渐兴起并繁荣。海上丝绸之路主要由南北两条线路分别连接朝鲜、日本以及波斯湾、地中海。北线是从山东半岛蓬莱出发，经渤海、黄海，或从江苏淮安出发渡黄海，从宁波出发渡东海，最后到达朝鲜半岛和日本。南线是从广州、泉州、明州等地出发，经过南海到达东南亚，经过印度洋，穿过阿拉伯海到达波斯湾，或者沿着红海到达叙利亚，经过地中海连接欧洲大陆。据载，在宋代“来广南、福建、淮、浙商旅，乘海船贩到香药诸杂税物，乃至京东、河北、河东等路商客般运见钱、丝绵、绫绢，往来交易，买卖极为繁盛”。^①

北宋时期，宋王朝最早在广州设立市舶使，主管海上贸易，山东沿海板桥镇至胶州湾北部的密州、杭州、明州、温州、秀州等处设有市舶司。元明两代，中国的政治中心由北方南移，经济中心也随之南迁。元世祖在广东设市舶提举司，后元仁宗时改在泉州、广州、庆元三地设市舶提举司，发放船只出海公凭，检查管辖港口船舶。海上运输效率远远优于陆上全靠驮马等交通工具的运输效率，因此在中西互通中的作用日益显著，逐步取代了陆上的丝绸之路而成为中国重要的“海上丝绸之路”。通过海上航线，宋代中国与五十来个国家都有货物贸易，出口农产品、纺织品、瓷器、金属制品等，进口香料、药材、宝物、布匹等，往来商品种类达四百多种。以山东的胶州、密州、莱州、登州等地为口岸互通海上贸易的国家主要是朝鲜、日本，其次是东南亚各国和阿拉伯的大食国。

据宋史卷一八六《食货志》中记载，海上互市还是以官方互市为主，但是民间的海外贸易同样十分活跃。^② 元代有大量的阿拉伯人和欧洲人从海路到中国。马可·波罗的游记也在西方广为流传，激发了西亚和欧洲商人对东方丝绸和瓷器等贸易的兴趣，中国这个神秘的东方古国也成为西方大航海时

①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〇九）》，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413页。

② 张照东：《宋元山东区域经济研究》，齐鲁书社，2006年版，第179页。